

《中苏》半月刊与文化抗战

范忠程

内容提要 《中苏》半月刊是湖南抗战刊物中存在时间长、出刊期数多和发行量大的几种期刊之一。它以宣传中国抗战和沟通中苏文化为职志,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外交各个层面。由于战时环境不稳定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刁难,该刊历经磨难,辗转长沙、沅陵和桂林。该刊结合抗战初期国内外情势及抗战的发展进程,着重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和前途;阐述了持久抗战和中国最后必胜思想;维护团结抗战局面,揭批汉奸投敌卖国罪行;宣传全民抗战思想,反对压制抗日民主运动。文章还简要地分析了《中苏》半月刊存在的主客观条件。

关键词 《中苏》半月刊 思想文化抗战 阵地

抗战初期,湖南长沙的抗日救亡刊物,多达 80 余种。其中有些是外地迁来的,如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月刊《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大多数是长沙各抗日救亡团体或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创办的,如《前进》周刊、《民族呼声》旬刊、《中苏》半月刊和《抗战文化》月刊等。新创办的刊物中,或因经费拮据,或因编辑人员流动,多数出刊几期或半年左右就停刊了。在这类刊物中,《中苏》半月刊可算佼佼者。它创办两年多,但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晓。它在宣传抗战和沟通中苏文化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中苏》半月刊及其在抗战初期进行抗日文化宣传,简要地作些评介。

—

《中苏》半月刊 1938 年 3 月 15 日在长沙创刊。它是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湖南分会的机关刊物。中苏文协湖南分会成立于 1937 年 12 月 19 日,会长覃振是国民党元老,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湖南桃源人;常务理事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李仲融、杨荣国等著名共产党人。《中苏》半月刊的编委先后有翦伯赞、谭丕模、吕振羽、萧敏颂、曹伯韩、李仲融、杨荣国、刘岳厚、陈介石、唐际清、欧阳敏讷、田朝凡等。

《中苏》半月刊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他们除上述核心成员外,还有杨东莼、张天翼、廖沫沙、蒋牧良、夏衍、薛暮桥、许涤新、孙伏园、沈志远、陈润泉、于刚、王西彦、吴明、张生力、刁牧夫、游宇、邓克生、刘梦秋以及翻译家田朝凡、王仁忱、王时风、宋弗洛、黄时彦等诸多学者、教授和文化人。《中苏》创刊后,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徐特立在该刊先后发表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今后抗战的任务》、《保卫湖南以保卫武汉的基本问题》等重要文章,分析抗战形势,宣传中共抗日的基本政策和主张。国民党政要孙科、覃振、邵力子、李济深也发表了《中苏关系与我国抗战前途》、《抗战与文化》、《巩固中苏的邦交》、《纪念“七·七”三周年与我们应有的努力》等文,主张在抗战中发展中苏友谊,加强国共两党团结合作。

《中苏》半月刊是一家综合性刊物。它以宣传中国抗战和促进中苏文化交流为职志,内容涵盖中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层面,每期字数 5 万左右。它围绕中国抗战,发表了不少政治理论性强、颇有远见卓识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论文和时评;大量刊登了研究苏联、介绍苏联的译文和专论。它还用散文、诗歌、短论、时事半月谈等方式,及时评介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现况”和中国

抗战的“情势”。该刊在《发刊词》中昭示读者：“我们在炮火下来发行这个《中苏》半月刊，内容当然不限于中苏问题，是要包括民族抗战各种问题的讨论。不过中苏关系，因其是和抗战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将侧重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苏联内情的介绍”。该刊内容充实，文章短小精干，深入浅出，现实性强，故读者面广。它在省城长沙期刊中，发行量保持在4000份左右的领先势头。

《中苏》半月刊由生活书店总销售，全国各大书店分售。初创时期，恰逢张治中主湘，湖南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为宣传中共抗战的主张、制造抗日舆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武汉失陷后，日军举兵南侵，湖南变成抗战前线。长沙文夕大火后，《中苏》半月刊随主管机关迁沅陵，1939年2月，落户沅陵总爷巷17号。刊物仍由生活书店沅陵支店经销，在全国各大书店分售。

193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湖南各地相应建立了类似机构。规定一切图书杂志的文稿在出版前，须交国民党审查，矛头直指进步书刊。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同月，薛岳接替张治中任省主席，湖南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沅陵县党部派出便衣特务，骚扰中苏文协湖南分会，抢走杂志图书；驻沅陵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随即非法传讯《中苏》半月刊主编翦伯赞。翦先生利用“文协”的合法身份据理抗争，顽固派的破坏暂时停止。6月中旬，平江惨案发生，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獗，翦伯赞成了迫害的重点对象。中共湖南地下工委通知翦转移溆浦，以民国大学教授为掩护，继续主编《中苏》半月刊，并在沅陵刊出。在溆浦，翦先生同样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监视和迫害。

1940年2月，翦奉中共中央之令，离开溆浦赴重庆。3月，当

《中苏》半月刊创刊号，第2页，1938年3月15日。

选为中苏文协总会理事兼机关刊物《中苏文化》月刊副主编,受中共南方局领导。此时,无论是政治环境或经济状况,《中苏》半月刊在沅陵很难维持下去。中共南方局指示,立即迁往广西桂林,由八路军、新四军驻桂办事处处长李克农领导。

4月15日,《中苏》第4卷由半月刊改为月刊,仍以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名义在桂林编辑出刊,桂林、重庆、昆明、贵阳设有发行处,主编还是翦伯赞。编者在第4卷1、2期合刊上的《编后》语里说:“本会所发行之中苏半月刊,因人事上、印刷上之种种困难,一再延期……本刊从本卷起,决定改出月刊。并拟尽量介绍中苏两国学术上有价值之文字,藉以使读者明了苏联之物质及精神的建设和我国在全民族英勇抗战的过程中关于文化的动态。”

《中苏》半月刊从1938年3月15日创刊至1940年11月30日第4卷第9期,存在两年零9个月时间。可分三个时间段:即长沙时期:1938年3月15日至11月长沙大火前,共出刊15期。包括第1卷1—12期(内9、10期合刊)、第二卷1—4期。沅陵时期:1939年2月15日至同年12月,共出16期,包括第二卷5—12期(内11、12期合刊)、第三卷1—11期(内2、3两期,8、9两期为合刊)。桂林时期:1940年4月15日至11月30日,共出8期,即第四卷1—9期(内1、2期合刊)。三个时间段共出刊39期。第4卷第9期是否终刊了?编者未作说明。

但此时,《中苏》半月刊的领导骨干,先后应召离开了编辑部。翦伯赞去重庆主编《中苏文化》;吕振羽被指派参加统战工作,并在迁渝的复旦大学执教;谭丕模任教民国大学并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因此,人力、物力、环境和资金均难支撑刊物继续办下去。

在两年多的日子里,《中苏》半月刊编辑部同仁,在中共领导

《中苏》月刊第4卷1、2期合刊封底,1940年4月15日。

下,备尝艰辛,团结战斗,坚守了民族抗战的思想阵地。其间,主编翦伯赞多次受到传讯、恫吓和警告,编辑刁牧夫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他们用智慧、胆识和汗水,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二

日本侵略者经过充分的战争准备,凭借其优势兵力和先进军事装备,制造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虽在前方英勇抵抗,但仍阻挡不住敌人疯狂的进攻。半年之内,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石家庄、包头、太原、上海、南京、杭州等30多个大中城市和华北、华东、西北等大片国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叫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不如日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散布民族失败主义,主张对日妥协求和。

中国抗战的前途如何?怎样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中国人,都在积极关注和认真思考。

在此民族危难、人心惶惑浮动之际,《中苏》半月刊应时问世。它以满腔的爱国热情,鲜明而坚定的政治立场,连篇累牍刊登文章,分析中国抗战的形势和前途,宣传中共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批驳亲日派汉奸投降卖国的言论,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打败侵略者,争取最后胜利。

首先,正确分析抗战初期国内外形势,说明中国抗战的前途。该刊的创刊号,发表了徐特立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今后抗战的任务》等重要文章,集中地阐述了中国抗战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必然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和最后必胜的结局。徐特立指出:“当中国战争相持于平津、平汉两线间……希特勒突然承认‘满州国’,并称赞日本是东亚的安定势力”;希特勒这种表态“是用一种政略帮

助日本进攻中国”,企图“把中国拉到投降妥协方面去”。他说:中国在国际上“并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民众“都同情中国抗日的”。社会主义苏联“不会让日本灭亡中国”。英美为“维护在华利益,也不会让日本独占中国”。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将“随着中日战争而发展”,“只要中国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动摇,国际间的变化终是有益于我们的”。

吕振羽的《欧局的变化与中国抗战》,分析了德、意“在欧洲权益上”矛盾不会“妥协”;英德、英意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也无法“调和”。伦敦张伯伦政府为换取英国和欧洲的“苟安”,不惜承认意大利并吞阿比西尼亚,牺牲奥国、捷克与德妥协,并怂恿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这种损人利己的“绥靖政策”是“不能得逞的”,其“坏的影响”是“给世界侵略者以精神的援助”,“帮助了日寇侵略中国”。他指出:由于“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抗战到底’的国策已定”,因而“牺牲中国的阴谋”,“没有实现的可能”。他用“正于”笔名在《中苏》半月刊上发表《抗战情势讲话》,以时事半月谈方式,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分析中日双方战情和国际大势。文章短小精炼,及时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关心战局,用具体事实对中国抗战前途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

翦伯赞在《抗战的过去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七个月”,“我们固然遭受了空前的巨大灾害和惨痛”,但我们不能只看见“失利”而看不见自己的“胜利”。文章从5个方面概述了中国抗战的成就和意义:(一)这次战争使从前“被人奴役、蹂躏、压榨而不反抗”的中国人民,“变成了民族解放战争中英

《中苏》半月刊创刊号,第4—5页,1938年3月15日。

《中苏》半月刊创刊号,第4—5页。

《中苏》半月刊创刊号,第11—12页。

勇的战士”。它“冲破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惧外的脆弱的心里”和“恐日病的根源”，恢复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了“为独立自由与幸福而斗争的热情”。（二）这次抗战“使全国人民在‘抗战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形成空前未有的民族大团结”。国共两党“共同携手”，“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两大柱石”和“完成民族解放”的核心指导力量。（三）这次抗战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至外交上，“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势”。由于各党各派的“大团结”，“开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统一的国防军队，统一的国防政府”。“政治民主化”开始起步。（四）日军在这次侵略战争中遭受了中国军民“英勇的惨烈的抗击”，使其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削弱了侵略的力量”。日军的巨大军费消耗，加深了日本国内的矛盾，动摇了“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日本走向崩溃的起点。（五）这次抗战“充分的暴露了日本强盗的野蛮”，也显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他要求人们认清抗战前途，树立必胜的信心，不要“为一时的部分的失利而悲观动摇”。上述文章，对人们正确认识中国抗战前途，克服悲观失望的消极思想，是有帮助的。

其次，宣传持久抗战的思想，鼓舞军民的抗战热情和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翦伯赞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在国防建设上，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上，在技术的应用上以及关于战争的国防工业与交通运输“都比较现代化”。“我们都是落后的”。又说：中国“长期分崩离析，团结方才开始，民众的组织和物力的动员都十分不够”；“民族的自卫战准备不足”；“军队还没有达到现代战争所必要的程度”；“政治机构没能完全适应战争的需要”；军民“还没有完全结合”，人民大众也“没有武装起来”。改造“这些弱

点”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需要我们“百折不挠、再接再厉的奋斗”。我们要“动员全国的武力、人力、财力和脑力,坚持长期抗战”,“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徐特立以徐州会战我军实行战略退却做例子,进一步阐述中国持久抗战的必要性:“经济落后的中国,不独物资上远赶日本不上,军队的组织训练教育也远落后于日本。”抗战开始时“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壮大,敌人的力量没有多大消耗”,在敌我强弱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不和敌军拼消耗”;“主要作战方式是“一面抵抗,一面准备”;通过“灵活的”游击运动战略,“消耗敌人,壮大自己,以转弱为强”。到“强弱对比相当”的时候,“再转变消耗战为歼灭战”。“徐州的退却与我们的战略原则是适合的”。

为了唤起全国军民持久抗战的热情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中苏》半月刊值抗战一周年之际,出刊了抗战周年纪念专号,发表了徐特立、吕振羽、翦伯赞、萧敏颂、杨东莼、陈润泉、谭丕模、曹伯韩、陈逸园等名家的重要文章,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群众运动、国际形势、中苏关系以及日本国内的危机等方面,分析、总结了我国抗战一年来的成绩及形势的好转。吕振羽以《伟大的斗争!伟大的进步!》为题,从宏观上对中国抗战的成就和进步作了概括。他说:战前,日本侵略者预计:军事上“短期内把中国征服”;政治上“分化中华民族”,挑起“内部互相残杀”;经济上,利用中国的“物力和财力”转而“征服”中国;文化上,“用奴化政策”,“消灭我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然而,经过一年的抗战,打破了敌人的“梦想”,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方面都获得了“伟大的进步”。在政

《中苏》半月刊创刊号,第9—10页。

徐特立:《从整个中日战争中来认识我军从徐州退却的意义》,《中苏》半月刊第2卷第6期第3页,1938年6月1日。

治上“结束了民国以来的内战分裂局面”,形成了“以国共为主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国内和平统一的曙光”。军事力量,“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其“英勇的斗争精神”,是任何外来暴力“所不能征服的”。我们的国民经济,开始朝着“民族的独立性”方向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仅未被毁灭,反而呈现出“大众的”、“以现代科学为中心的”抗日民族新文化。“恰恰相反”,敌人一年的侵华战争,“其军事、经济力量日益削弱”,“国内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国际关系“处于‘光荣’的孤立”。日军侵略者现在“一天天地在接近失败”。

在《抗战一年来的中国军队》一文中,罗德对军事抗战进行了专题性研究。指出:“一年来的抗战,我们打破了敌人所谓‘三个月’击破我军,征服中国的狂言,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无数次的战役胜利“扫除了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与恐日病患者的错误观念,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抗战的一年,“游击战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创造了以晋察冀为主要基础的广大游击根据地”,游击队的活动“直逼平、津、保等主要城市,吸引和牵制了敌人”,“有力的配合了我军主力的行动”;在敌后,我们恢复了政权和巩固了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前线,从外线包围了敌人”。文章还对抗战一年来,中国军队的组织纪律性的加强,政治觉悟、作战能力、牺牲精神的提高,以及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的改善进行了总结。

抗战,唤醒了文化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激情。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各界文化人士“不分阶级和信仰”,联合起来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的文化团体,自觉地“把文化工作与抗日救国结合起

吕振羽:《伟大的斗争!伟大的胜利!》,《中苏》半月刊第1卷9、10期合刊,第6—8页,1983年8月1日。

罗德:《抗战一年来的中国军队》,《中苏》半月刊第1卷9、10期合刊,第13—14页。

来”,使文化服务于“抗战”。把自己看成是“抗日救国力量”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未有的现象”。

总之,抗战周年专号上的文章,从宏观和微观说明抗战初期,由于我们的综合国力弱,不能有效地阻止敌人的进攻,抗战是持久的;中国丢失了大片国土,人民遭受空前的灾难。然而,一年的艰苦抗战,初步考验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和“三个月征服中国”的战略企图,给敌人带来各种困难和失败危机。

再次,揭露和打击汉奸的叛国投敌活动,维护全国统一和团结抗战的局面。日军采取两手的侵华政策:一方面企图通过军事进攻,“速战速决”,武力征服中国;另一方面,使用政治诱降手段,收买中华民族败类,拼凑汉奸政权,实行“以华制华”,破坏抗战,分裂中国。这两手同时或交替使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更重视在政治上推行“以华制华”政策,扶植伪政权出台。

针对敌人的阴谋,《中苏》创刊伊始,即把揭露和打击亲日派汉奸破坏抗战,叛卖祖国的活动,作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它在《发刊词》中明确揭示:“汉奸、托派和亲日派,他们为侵略者所役使,在国际方面,以破坏反侵略的和平阵线为能事;在中国国内,以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为能事”。苏联是“世界和平阵线的支柱”,“是中国抗战最真实的友人”。亲日派汉奸便“集中全力中伤苏联阻止中苏的提携”。

吕振羽的《坚决“否认伪组织”和“厉行肃清汉奸”》一文,侧重剖析亲日派汉奸产生的社会条件及其破坏活动规律。他说:“汉奸的产生有其社会的根源”,“主要是一些没落的失意政客,军阀时代

陈润泉:《抗战一年来的中国文化》,《中苏》半月刊第 1 卷 9、10 期合刊,第 15 页。
《发刊词》、《中苏》半月刊创刊号。

政治上遗留下来的残滓”，如王克敏、汤尔和、梁鸿志、缪斌等。他们“无不是”政治上罪案累累的政治流氓”。汉奸们的“丑陋面目及其历史，久已彰明昭著”，因此，他们的“活动方式”，采取“流氓主义”、“两面派的”手段：其一“利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某些……薄弱的或落后的环节”，利用“群众对于统一战线的政治觉悟不够”，进行破坏活动；其二，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全面抗战爆发后，举国一致抗日，但“社会内部次要的渐趋和缓的矛盾还存在”。汉奸们“使用种种阴谋”手段，扩大和激化这些矛盾，阴谋分裂团结抗战；其三，一些“无固定政治意识的流氓无产者群和政治觉悟落后的群众”，他们遭受战争的“苦难”，“生活上失去依托，政府又未及时给予教育和帮助，他们是社会上的后进层”。汉奸们乘机潜入，施用收买或煽惑的手段，拉拢这些“政治意识落后的”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民族分裂，借“以削弱抗战的力量”。其四，在战区汉奸们虽不敢明火执仗从事破坏，却躲进“黑暗处去活动”，或者“喊着‘抗日’的口号”，“混进群众里面，迎合群众的心理”，“利用某些弱点和缺口，制造群众团体内部的纠纷和误会”，“妨碍各种抗战动员工作”。吕振羽说：汉奸们使用的这种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比那“单纯替敌人放信号、作引线、破坏交通、扰乱秩序的”汉奸，其“危险作用，还严重得多”。上述分析，对人们认识汉奸们丑恶本质、两面派的活动特点和规律，以及开展肃清汉奸的斗争，都有帮助。

翦伯赞发表了《论反汉奸斗争》的文章，其第一部分阐述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侵华政策有所调整。因为，经过中国军队一

《中苏》半月刊第1卷第4期，第3、4页，1938年5月1日。

《中苏》半月刊第1卷第4期，第3、4页。

《中苏》半月刊第1卷第4期，第3、4页。

年多英勇抗战,使敌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显出了疲弱”,“人民负担重累”,国内“反战浪潮高涨”,“敌人无法集中主力进行像过去那样大的战斗”。而且,武汉、广州失守后,中国“依然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使得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彻底破灭。这样,敌人在侵华的策略上十分重视“以华制华的毒计”。所谓“以华制华”政策,就是收买汉奸和民族败类拼凑傀儡政权,充当日军侵华的工具和走狗,利用他们“从内部瓦解抗战阵营”,分裂民族团结,“用政治诱降来代替军事上的进攻”,“以遂日寇灭亡中国的企图”。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从内阁到军部,都加大了政治诱降的“以华制华”政策。汪精卫集团,北平、南京的伪组织,为适应其主子的需要,也加快了叛国投敌和分裂中国的步伐。文章第二部分强调了反汉奸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极端重要性。指出:“汪精卫通敌求降叛国”的发生,是“日寇一贯阴谋的总暴露”,也是“亲日派汉奸丑态的总揭发”;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加强了“抗日民族的统一与团结”。但能不能说汉奸“完全从我们内部清洗了呢?”“不能这样说”。因为,日本“正在计划成立全国的傀儡政权”,一部分汉奸分子“改换脸谱,隐藏在抗战营垒”内部,暗中挑拨离间,与日寇“里应外合”;一部分“患恐日病”的人,“时刻在动摇政府的抗战决心”,主张对日“和平妥协”;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仍然“悲观失望”,对最后胜利发生动摇,“不自觉的被日寇和汉奸所利用”。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特地飞到了中国汉口,“重新进行分裂中国统一团结和瓦解中国抗日政

翦伯赞:《论反汉奸斗争》,《中苏》半月刊第 2 卷第 7 期,第 3、4 页,1939 年 3 月 15 日。

翦伯赞:《论反汉奸斗争》,《中苏》半月刊第 2 卷第 7 期。

翦伯赞:《论反汉奸斗争》,《中苏》半月刊第 2 卷第 7 期。

权”的阴谋活动。一大群民族败类、汉奸、托派已“团结在这个日本流氓的周围”。这说明汉奸“并未被根绝”，他们的破坏活动也“没有停止”。我们决不可“安枕高卧”。翦文最后针对汉奸破坏活动的主要方面，简要地提出了反汉奸斗争的4个原则：即拥护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加强全民族团结，坚持抗战到底；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结成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国际和平阵线；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认为：“只有坚决执行以上四点，才能有效地与日寇及其走狗汉奸进行斗争。”

汪精卫等抵达河内后，表示接受“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1月，近卫内阁辞职，汪精卫即派高宗武赴东京，代表他与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2月，达成一个以投降、卖国、反共、破坏抗战和“日中和平友善”为基本内容的非正式的《汪—平沼秘密协定》。4月，汪在日方保护下，秘密从河内潜回上海。接着与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飞抵东京，与其主子具体商谈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这一卖国阴谋活动披露后，5月，翦伯赞发表《汪精卫是汉奸的首领》的重要文章。分别揭批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阴谋，和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罪行。指出“汪精卫是汉奸的首领”，亲日派汉奸是“法西斯的走狗，是全中国人民的敌人”。文章最后提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民，每一个领导抗战的政党，应当把‘反汪肃奸运动’提到他的政治工作的第一课。”8月下旬，汪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决定“还都南京”。11月初至12月底，汪与日本在上海谈判，最后签订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纲

翦伯赞：《迎接敌人的新进攻》，《中苏》半月刊第2卷第9期，1939年4月15日。

翦伯赞：《论反汉奸斗争》，《中苏》半月刊第2卷第7期。

翦伯赞：《汪精卫是汉奸的首领》，《中苏》半月刊第2卷第10期，第2、3页，1939年5月1日。

要》。主要内容有：汪伪承认“满洲国”，华北、蒙疆为中日“密切合作地区”，长江下游和华南沿岸岛屿，中日在经济、军事上“密切合作”；汪伪军警由日本训练，武器由日本提供；汪伪中央和地方政府聘日本人作顾问；中国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中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财政金融等业均向日本开放。这个《纲要》是汪精卫集团继《汪—平沼秘密协定》之后，又一个更为具体的卖身契，也是他准备成立伪政权的重要步骤。1940 年 1 月下旬，在日本操纵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为首的一群汉奸，举行青岛会议。商谈他们在即将成立的伪政权中排位、分脏问题。3 月 30 日，汪记傀儡政府在南京正式粉墨登场。4 月 15 日，《中苏》月刊发表邓克生《消灭汪系汉奸》的文章，指出《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其卖国罪行“超过了二十一条”，“足以亡国灭种”。“汪精卫傀儡组织之成立，不是为的别事，正是为实现这个亡国灭种的纲要”。汪伪傀儡政权的出台，“暴露了日本军阀无力解决‘中国事件’”，“也暴露汪系汉奸们的日暮途穷”。汪伪汉奸是“丧绝天良的凉血动物”，“是最无耻的民族罪人”，“他们登场愈快，愈自灭亡得快了”。

复次，宣传全面抗战思想，反对压制民众抗日运动。张治中主湘时期，执行联共抗日政策，开放民众抗日运动，准许共产党组织领导抗日群众团体。他一再告诫部署：我们的“责任是发动三千万人民抗日自卫”，“只有政府的主张，而没有人民的意见”是不可以的。我们“不怕人民说话，而只怕人民不说话”；“我们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但这些正确主张，遭

邓克生：《消灭汪系汉奸》，《中苏》月刊第 4 卷第 1、2 期合刊，第 11、12 页。

张治中：《我们愿多听人民说话》，《湖南省政府公告》，1938 年 5 月 16 日。

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 页。

到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而难以实施。

1938年7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指令:宣传共产主义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加取缔。8月17日武汉卫戍司令部以民众抗日团体“有名无实”、“分子复杂”为由,下令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武汉青年救国会。同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解散湖南职抗会、逮捕文抗会从事救护难民、伤兵工作的成员。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则以“贩卖违禁反动书刊”罪名,查封了金城、新知、大上海、自力4家进步书店。11月,长沙警备司令部查封《长沙晚报》,薛岳任省主席后,情况更加严重。

针对以上情况,《中苏》半月刊登文章,支持张治中动员民众、联共抗日的民主进步措施,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阻挠、破坏动员民众抗战。1938年8月,谭丕模发表《抗战一年来的青年运动》一文,列举“民先”、“青救会”等青年抗日救亡团体,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无论在前方、后方,无论在部队、学校、工厂、农村都“表现出最英勇的战斗精神”,“尽着推动机的作用”。指出:“有名无实”纯系诬陷不实之词。他“希望政府不要害怕青年、怀疑青年,而要积极组织青年、领导青年”。9月,他在《动员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指出:现在湖南抗日民众团体很多,如抗敌总会、商抗会、工抗会、文抗会、妇抗会等等。“但动员的程度还不够”,“大多数的民众还关在抗敌门槛之外,没有汇集到抗战的洪流里面来”。全民动员是“打倒日寇的基本力量。而组织民众团体,又是动员民众唯一的捷径”。他要求南京“党政当局应加强领导,不应当对民众团体轻易怀疑而给以解散的处分”。10月,他在《对于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

魏宏运等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中苏》半月刊第1卷第9、10期合刊,1938年8月1日。

《中苏》半月刊第1卷第12期,第5页,1938年9月1日。

期望》一文里强调：“民众是抗战的基石，党政当局应当善为领导他们汇集到抗战的洪流”；“政府对民众组织，应当采取指导的态度去扶助它，不应当采取严厉的态度去制裁它”。翦伯赞在《论解散抗日团体》一文里，首先对武汉卫戍司令部解散“民先”和“青救会”，湖南省党部解散职抗会提出批评：“像这样的事实，不幸竟发生于民族生死存亡紧急关头的今天，这真是为亲者所痛而为仇者所快”。接着指出：“民众团体分子复杂”，“也不足以成为应该解散的罪名”。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中国人民的全体”，不分“种族、党派、阶级、职业、年龄、性别”，“统一团结抗日”是我们的“国策”，“它需要各党派各阶级各职业分子，统一团结在抗日的团体中”，因之“分子复杂是当然的事”。这“正是全民族统一与团结的表现”。他要求当局“收回”解散民众抗日团体的“成命”，不做“削弱自己的力量，使敌人高兴”的事情。覃振在题为《动员民众与保卫大武汉》文中，说明“要加强抗战的力量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需依靠民众的动员，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民众不动员起来，专靠前线军队，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十五个月来抗战的教训”，就是“证明”。他对政府单靠军队抗战，忽视民众动员提出了批评。王仁忱在《走向抗战的第二阶段》一文中呼吁：政府应“广泛的进行动员工作”，“积极地领导民众抗日运动，给他们以更多的抗日的自由，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使全国人民“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口号下，“贡献抗战，参加抗战”。

《中苏》半月刊第 2 卷第 3 期，第 3 页，1938 年 10 月 16 日。

《中苏》半月刊第 1 卷第 12 期，第 3 页，1938 年 9 月 1 日。

《中苏》半月刊第 2 卷第 3 期，第 2 页，1938 年 10 月 16 日。

《中苏》半月刊第 2 卷第 5 期，第 3 页，1939 年 2 月 15 日。

三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度积极抗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1938年3月底,国民党临代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写有“发动全国民众”,“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等内容,表示要开放抗日言论。张治中主湘期间,开放民众抗日运动,准许成立抗日民众团体,创办抗日报刊和学校,邀请共产党人参加政府领导的抗日救亡机构。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为创办《中苏》半月刊等抗日报刊提供了合法的生存与活动空间。

《中苏》半月刊是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机关刊物。中苏文协湖南分会是中苏文协总会的分支机构。总会成立于1936年,是中苏两国复交后为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中苏文化交流而设立的。会长孙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陈立夫、邵力子为副会长。中苏文协湖南分会是湖南中上层人士的统战组织,会长由南京政府立法院副院长覃振兼任。理事会的成员系湖南国共两党和无党派的知名人士。理事会成立后,为动员湖南民众抗日和沟通中苏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总会的肯定和好评。1939年12月,文协湖南分会成立两周年之际,孙科特电致贺,赞扬分会对于沟通中苏文化、动员民众抗战“独多献替”,“迂沅以还,尤见坚苦宣劳,精神激发、良堪钦嘉!嗣后,更希迈进图功,完成本会任务”。孙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1987年版,第3—4页。

《中苏》月刊第4卷第1、2期合刊,第4页,1940年4月15日。

科等对湖南分会工作成绩的赞扬与肯定,对湖南国民党顽固势力刁难分会和《中苏》半月刊,客观上起着抑制的作用。

编辑出版《中苏》半月刊,是湖南分会一项主要工作。《中苏》半月刊从成立起,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在长沙,由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省工委宣传部长谭丕模为《中苏》编委会成员。迁沅以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湘西文化工作委员会,谭丕模兼书记,编委会中共党员都是文委委员。入桂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托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直接领导。中共党员是编委会的领导核心。在杂志的编委和作者群中,许多人是文史哲兼备的著名学者。他们在《中苏》半月刊上先后发表了不少对抗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如徐特立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今后任务》、《保卫湖南以保卫武汉的基本问题》,吕振羽的《欧局变化与中国抗战》、《敌国内阁的改组和今后战局的估量》,翦伯赞的《抗战的过去及其前途》、《论反汉奸斗争》,邓克生的《论九年来的各国对华外交》等,都是当时指导中国抗战的重要文章。这些文论,从世界与中国、宏观和微观、理论与实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敌我形势,抗战前途,战争规律和最后结局等问题,作了高屋建瓴和深入浅出的分析。特别是徐特立的论文,对中国抗战更具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指导意义。“当时,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常以该刊的言论作为重要依据,宣传中共的方针和政策”。《中苏》半月刊,在抗战初期湖南抗战政治文化宣传中起到重大作用,不愧是文化抗战的坚强阵地。

(作者范忠程,1932年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01页。